

文化論述的力量—

評《文化與抵抗》



文化與抵抗

Edward W.Said著;梁永安譯
立緒 / 9308 / 300元
ISBN 986741604 / 平裝

被公認是全球後殖民論述大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伊德（Edward W.Said）於 2003 年 9 月去世，知識界對他的印象除了傑出的文學評論家之外，他的巴勒斯坦人身份，以及他在 2000 年 7 月，在以色列與黎巴嫩南方交界的村落 Kfar Kila 向以色列的哨所扔擲石頭的照片，在他生前引起軒然大波，在他死後隔天的各大媒體，也佔了顯著的版面。這張照片在初刊出後，引起部分人士藉口要求哥倫比亞大學解聘薩伊德，最後哥大則以薩伊德的行為受學術自由保護，拒絕加以懲處。這張照片成為後人對薩伊德的記號。而薩伊德則說，「我擲它，是為了對以色列佔領黎巴嫩南部二十一年的行為表示不齒，是為了以色列在 1982 年入侵黎巴嫩時所殺死的一萬七千人，是為了在希姆監獄受到折磨的八千人…」（頁 104）

《文化與抵抗》是薩伊德去年 9 月去世後，年底在美國出版，中譯版在今年八月由臺灣的立緒出版社出版。這是薩伊德接受美國媒體人巴薩米安的系列訪談，這本訪談錄分為 6 個章節，依序是〈單一國家方案〉、〈

自由時報記者 ◎ 王昱婷

2000 抗暴運動〉、〈他們希望的是我閉嘴〉、〈恐怖主義的根源〉、〈以巴勒斯坦人的觀點看以巴衝突〉、〈在勝利的集合點〉。訪談時間從 1998 年 2 月 8 日到 2003 年的 2 月 25 日，其間更經歷了重挫美國的九一一事件。

1948 年對巴勒斯坦人是個不能遺忘的年代，薩伊德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在黎巴嫩邊界向以色列崗哨丟擲石塊時，做了以上表示。然而，在書中，薩伊德並沒有要自己族群的痛苦再強加給他人，或是煽動報復。而是以人道和平的方式去解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巨大鴻溝。薩伊德在訪談中，用平實的字句娓娓道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以色列的殖民霸權，然而仍堅持「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觀念，同時也對美國以維護自身利益動輒出兵他國的作法嚴加譴伐。

薩伊德曾憶及，1948 年之後的耶路撒冷，他的一位同班同學伊芝拉，也是當時七年級唯一的猶太人，「在我的人生與巴勒斯坦隨後發生的變遷的觀照之下，我每次想到他，都心頭一緊，而且覺得像個謎一樣。…下午放學，我們三五成群步行離開學校，好像過檢查哨人口多比較有安全感，他不曾加入。我最後一次看見伊芝拉，他站在路上那一頭，朝我的方向望過來，我們三或四人慢

慢來回塔爾比亞，聖誕節前，我家人決定我們最好還是返回開羅，我與伊芝拉的關連就此打斷，這事很快就成為一個象徵，象徵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無可彌合的鴻溝，因缺乏討論的言語概念而壓抑下來的鴻溝，以及那一刻起強加在我們共同歷史上的可怕沈默。」（《鄉關何處》，頁154）

在這本訪談中，並沒有艱深難讀的學術字眼，薩伊德自始至終要強調的是，以巴衝突的解決方案，和平是唯一的選項。以色列是二次大戰的受害者，這是歷史事實，然而「過去五十四年來，以色列人都受惠於歐洲人、基督徒和美國人對納粹大屠殺的罪疚感。不幸的是，為此付出付價的卻是巴勒斯坦人。」（頁148）

身為受害者的受害者，以巴長年來的屠殺仇恨，有沒有可能化解？在整個區域，以色列人的屯墾區不斷擴大，巴勒斯坦面對殖民強權沒有能力還手，只能藉由記憶做抵抗。但就現實面來說，未來十年內，在該區域中，巴勒斯坦人數將會比以色列人多，這也是以色列的最大危機。薩伊德認為，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承認那是一片住著兩個民族的土地，唯一的希望就是願意以平等的方式並存，兩個民族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與文化，而不是以一方凌駕於另一方的方式並存。

在訪談中，薩伊德說了一個令人動容的例子。薩伊德與長於以色列的音樂家巴倫波因是好友，而他在1999年安排巴倫波因在約旦河西岸的巴爾宰特大學舉行一場獨奏會。巴倫波因的音樂會門票極其昂貴，但他卻免費為巴勒斯坦人演出。然而，巴爾宰特大學在抗暴運動期間被關閉了半年，校長被驅逐了20年，直到演奏會的3個月前，還有一個

學生在校園附近遭以色列士兵殺害。而以色列人巴倫波因所舉行獨奏會的禮堂就叫「卡邁勒·納瑟廳」，卡邁勒於1973年在貝魯特被以色列勞工黨暗殺。

做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有力的發言者，薩伊德從歷史的傷痛中，尋求和解之道。全世界是否都能了解巴勒斯坦人的苦痛？以巴的衝突，來自於一個受過苦痛的民族，強加痛苦給另外一個民族。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所承受的壓迫，不能被否認，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壓迫另一個民族」。（頁206）除了經常發生的爆炸死傷案件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仍在持續。「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每一部份，一從上學到上班到上菜市場——都受到以色列部隊的規限。你得先通過一個又一個的檢查站。哪怕是需要就醫，哪怕是病情緊急，你仍然得排幾小時的隊接受檢查。人們往往就這樣死掉。學校經常關閉。單是約旦河西岸就有幾百個檢查站。迦薩地帶形同一座碩大的監獄。它三面都被通電的鐵絲網完全包圍起來（第四面是海）。轟炸、推倒民宅、摧毀農田、拘禁年輕人——以色列用盡一切辦法來羞辱和懲罰巴勒斯坦人。」（頁184）而解決以巴衝突的方法，就是重建一個雙民族的國家。

全球最大強權美國，無疑是以色列最大的後盾，也是以色列的最大軍火供應商。而由於美國人對巴勒斯坦傷痛的陌生，加上媒體對伊斯蘭的「認識」，形塑了文明衝突的觀點，也把伊斯蘭等同於暴力與恐怖主義。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更是達到高峰。薩伊德以一個紐約人的心情提出九一一之後的沈痛，但也承認這次的攻擊是對美國過去一整個世紀的海外介入的一次反彈。而今，「恐怖主義」已成為「反美主義」的同義詞，而



後者又成了批評美國的同義語，成了不愛國的同義語。薩伊德指出，海珊與賓拉登曾經接受過美國的支援，而今，美國只因為要捍衛他自己的利益，而任意介入任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事務。薩伊德說「我們需要的是回到 1970 年代聯合國關於何謂『恐怖主義』的辯論。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在 80 年代把抵抗蘇聯入侵的阿富汗『聖戰士』稱為『自由鬥士』，而現在卻把他們企圖抵抗另一些國家入侵的行為看作恐怖主義」。（頁 112）而更可怕的是，除了恐怖主義之外，薩伊德提醒大家，還有一種『國家恐怖主義』。

九一事件的延續，是美國終於再次出兵伊拉克，逮捕了海珊，表面看似成功的軍事行動，在虐囚及伊拉克遲能回復和平的現況中，留下美帝主義的確切痕跡。對照美國對中東的介入，曾經是世界警察的美國強權，到底執行的是世界的秩序維護，還是只是捍衛自己本身利益的黑道大哥？

貫穿這本訪談錄的主題，是文化。薩伊德批判杭亭頓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中東的問題不在文明衝突，而是在於雙方必須坐下來了解對方，而存在於西方普遍對伊斯蘭文明的誤解，也造就了文明衝突的謬論成長。薩伊德延續《遮蔽的伊斯蘭》一書中對西方主流媒體的批判，媒體形塑了我們觀看的世界，而媒體也從未真正認識伊斯蘭，甚至形塑一個單一暴力的外相。

「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頁 159）在被壓迫的歷史中，有關於巴勒斯坦人所有檔案資料均被摧毀，以色列人想要抹殺這塊土地曾經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強把「應許之地」的神話意象要現實化。然而，

殖民者要壓抑，民眾總有反抗的意志。至今巴勒斯坦人的國籍，依然是「未定」。沒有國家，沒有政府，儘管如此，「幾乎每一戶巴勒斯坦人家（哪怕他們已是 1748 年以來的第三代）都仍然會保存著祖屋的鑰匙、舊信、舊契約、老照片、舊剪報——這些都是我們的生存相對整全的時代的遺物，而保存它們，就是為了保存那個時代的記憶。記憶是一種保存身份認同感的有力集體工具。它不仅可以透過官方論述和書本來保存，也可以透過非正式的記憶來保存。那是抵抗歷史被擦拭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種方法。」（頁 183）

位於亞洲太平洋上的海島臺灣，中東卻是遙遠的彼端。從二次大戰以來，臺灣的命運就仰賴美國的態度，加上中國的興起，臺灣雖位於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戰略位置，卻因島內政治意識的拉扯而陷於極度混亂，對於美國的依賴也更甚。甚至連臺灣迎向世界的觀點，都以美國所形塑出來的樣貌。連要不要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議題，都可以在臺灣的立法院討論許久。或許出兵伊拉克的考量牽涉到臺灣國家地位的被承認，然而更可看出一個未定國家的悲哀。

薩伊德的訪談錄，提供了以巴衝突的另一個了解面向，透過電影與文字，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所受的苦難，深入人心，然而正上演中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卻很少觸動人心。這是文化與媒體的力量。苦難無法量化，我們無從得知 1949 年流亡來臺灣的人，跟 1949 年之後，得在臺灣自己這塊土地上流亡的人程度上的差異。然而，這本書是個窗口，看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同時，也觀照自身。